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三八期 ——
(二〇一四年四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404b)

【往事回首】	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解决上海问题	李海文
【亲历者言】	保健护士谈江青的饮食起居	周淑英·赵柳恩
【书刊序言】	《罗瑞卿案》代序：追寻历史的真相	萧冬连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往事回首】

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解决上海问题

• 李海文 •

在 1976 年 10 月 6 日粉碎“四人帮”后的几天里，华国锋主持召开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一系列的决策，并同时研究了解决上海问题的方针。

◇ 华国锋说：对犯错误的同志，一要看，二要帮

1976 年 10 月 6 日晚，华国锋在抓捕“四人帮”之后，驱车来到玉泉山 8 号楼叶剑英的住地。晚 10 时 30 分，华国锋挽着叶剑英的手，一起走进了会议室。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共 11 人。政治局委员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陈永贵，政治局候补委员有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

华国锋提议请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讲话。叶剑英要华国锋主持。

华国锋说：“我现在向政治局会议宣布：今天晚上已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隔离审查。”随后，他介绍了抓捕“四人帮”的全过程。

华国锋与大家研究即将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他说：“既要解决问题，又利于大局稳定”，“要破得彻底，立得正确”。

华国锋说：“我们同‘四人帮’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对于这一点，必须有清楚的认识。对跟着‘四人帮’犯了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在他们当中，参与‘四人帮’阴谋活动的是极少数，受‘四人帮’思想影响而犯了错误的是大多数。参与阴谋活动的，还有浅有深。无论是浅是深，只要把参与阴谋的那一套向党向人民讲清楚，同‘四人帮’划清界限，我们就欢迎。打击面要缩小到‘四人帮’及其一小撮不肯改悔的死党身上。至于受‘四人帮’思想影响而犯了错误的，更要着重教育，帮助他们分清路线是非，认识错误的内容、危害、原因和改正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一要看，二要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方针，是延安整风的优良传统。这个方针和传统，长期以来遭到‘四人帮’的严重破坏，我们要在斗争的实践中切实地把它恢复过来。”

会议研究了上海问题。

大家分析了上海的实际情况。上海是“四人帮”的发迹地。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的控制和指挥从来没有放松过，他们调到北京后，还一直兼着上海的市委书记，张春桥是第一书记，姚文元是第二书记，王洪文虽是党中央副主席，却又是上海市委书记，排在张、姚的后面。张春桥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历来看不惯他的那一套。张春桥根本指挥不了部队。

华国锋讲：“只要把上海的问题解决了，其他各省市的问题就好解决。其他各省市的造反派和‘四人帮’比起来就是小玩闹。”

华国锋说：“‘四人帮’在上海拉过警备区的四个领导干部，号称有四个‘枪杆子’，只有周纯麟没有拉过去。先让马天水 and 周纯麟来。先做马天水的工作。”他想了想又说：“同时通知丁盛、廖汉生（南京军区政委）。”

华国锋让周纯麟与马天水一同来北京，有几个考虑：其一，周纯麟是上海警备区司令员，负责保卫上海。其二，“四人帮”一直整他，他是一个可靠的老同志。其三，只叫马天水一个人来，他可能会生疑而不来，如果他不来事情就难办了。

马天水、周纯麟二人于7日下午从上海到达北京。

◇ 在中央政治局打招呼会议上，马天水态度顽固，提出无理要求，华国锋派苏振华、倪志福做他的工作

7日上午，中央政治局要谷牧派精干可靠的人员到上海了解情况。同日下午，党中央派专机将上海、江苏、山东、湖北等地的负责人和济南军区、武汉军区的领导接到北京。华国锋首先派人将彭冲接到玉泉山，说：“今天找你们来，告诉你们，中央解决了‘四人帮’的问题。”

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召集到京人员开会。马天水走进会场，见华国锋、叶剑英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中，王、张、江、姚四人没来，心里一惊，又故作镇静地和大家热烈握手，热情地打招呼，一切如常。

华国锋主持会议，叶剑英首先宣布中央已于6日对“四人帮”隔离审查。

听到这个消息，到会的绝大部分人都十分激动，周纯麟高兴得几乎从沙发上跳起来。马天水傻了眼，抱头闷坐在那里。

华国锋系统介绍了毛泽东从1974年起对“四人帮”的不满和历次的批评，介绍“四人帮”如何阴谋篡党夺权，以及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必要性。

会场气氛热烈，不少人插话。

华国锋手上拿着三份毛泽东的手稿，说：他们大造舆论，几种报刊都是他们控制的。他们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其实是我在1974年4月30日，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把我留下。我报告主席，整个形势是好的，有几个省，浙江、江西、福建、云南有问题，政治局要讨论研究解决。主席写了三张纸给我三句话，一张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一张是“照过去方针办”，一张是“你办事，我放心”。我正式给政治局传达前两张，后一张没有传达。“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在告人民书里，在悼念词里他们不写，在社论里讲了。六个字改了三个字，作为临终嘱咐大做文章。当时主席逝世，我们都很忙，忽略了这个事。乔冠华在联合国的讲话稿，讲了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在2日看了把这个字改了。张春桥又批了“暂时不要传达”。到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用梁效的名义，文章里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陈锡联同志从唐山回来，对我说，我们都是叛徒了。在悼词里面不提“三要三不要”，讨论时，陈锡联同志提出要把“三要三不要”加上去，姚文元淡笑了一下，还是没有加上去。后来，汪东兴同志又向我提出，经我坚持，加上去的，张春桥表示写就写吧。

会议一直开到8日凌晨。会议宣布几条纪律：不准私自向外面打电话，不准写信，不准外出，不准接待客人。

8日清晨，华国锋看了看表，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晚上继续开，大家发言。”他对马天水说：“你回京西宾馆后，立即给徐景贤、王秀珍打电话。”

华国锋回过身来，对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说：“老周，派车，你送马书记回京西宾馆。”并向他使了个眼色。周会意地点了点头。

在去宾馆的路上，周纯麟、马天水、周启才坐在同一辆车里。周纯麟敲了马几句：“你今天为啥不高兴？大家都很高兴啊！而你连记录都不做，回去怎么传达啊？”

马天水说：“我好像被打了一闷棍！这些事，以前我一点也不知道啊！”

周纯麟说：“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大事，也是上海的大事，今晚大家都还没来得及发言，明天你可要好好表个态！”

马天水却说：“这些材料说服力不强。毛主席去世还不到一个月，他们就那么坏吗？我不同意把他们抓起来这种办法，就是有错误，也应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给他们有检讨改过的机会嘛！难道四个人都是一样的错误吗？”

周纯麟说：“华主席讲话时，材料都说得很清楚，证据确凿，你又不是没听到。他们谋害毛主席、反对周总理，难道还是假的吗？！你对他们的不少事情都是很了解的，应该老老实实地说出来。”

三人到京西宾馆后一起上了楼。周纯麟回到自己的房间，周启才跟着马天水进了套间。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等了一夜，因他不了解中央开会的内容，一直未向上海报平安。听到楼道里的脚步声，房佐庭马上跟着一同进屋。

马天水一进门就对身后的房佐庭说：“给我要徐景贤的电话。”不一会儿，徐景贤的电话接通，秘书将话筒递给马天水。马天水当着周启才的面不敢造次。

华国锋知道马天水不会转变，要争取、教育他。在政治局内由谁来做他的工作比较合适呢？东海舰队驻在上海，苏振华是海军政委，可以指挥东海舰队，不怕上海闹事。倪志福是上海人，又是工人、劳动模范，在上海有一定的影响。他决定先由苏振华、倪志福做马天水的工作。

8日下午，苏、倪来到京西宾馆，先到周纯麟的房间，向他了解马的情况。

周纯麟说：马天水情绪不好，一上午没有起床。他坚持说材料不真实，说服力不强，还自言自语道：“看样子我是回不去了（指回上海）。”周又把昨晚在车上的话说了一遍。他们仔细商量后，一起到马天水的房间。马天水仍转不过弯来，提出要见“四位领导”。

苏振华严肃地指出：“马天水同志，你在‘四人帮’的泥潭中陷得太深了！现在你必须转变立场，不然你将犯更大的错误，甚至犯罪！希望你能猛省。”

谈话后，苏振华、倪志福、周纯麟共同进行了研究。周提出：马天水虽是上海的总管，现在他乱了套，不如让徐景贤、王秀珍来京解决问题。苏、倪同意周的建议。

8日晚上，中央政治局打招呼会议又开了一夜，江苏、山东、湖北等省和南京军区、济南军区、武汉军区的人发言，对“四人帮”进行揭发和声讨。只有马天水情绪消沉，不讲话。

华国锋、叶剑英等向大家介绍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情况。大家纷纷表示拥护中央的决策。

马天水最后一个发言，神情紧张，脸涨得通红，不停地问：“这‘四位领导’，是不是篡党夺权，是不是一定要用抓起来隔离审查的办法，应该给四个人考虑的时间。中央是不是再给一些材料看看？”他还提出了两个荒谬的要求：一是让他再见的他们；二是希望中央对他们宽大处理，处理时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各省市、各大军区的领导人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到9日晚，中央打过招呼的各省市、各大军区已近一半，而且和上海临近的江苏、山东、江西、福建的领导人都已谈过，大家都一致拥护中央的决定。以前到北京来开会，上海后台硬，经济实力雄厚，大家见了马天水格外热情；而现在没有几个人理他，马天水形单影只，好不孤立。马的态度也有变化，走路低下了头。

◇ 政治局接到上海小组的报告，召周纯麟汇报，决定召徐景贤、王秀珍来京

9日晚，中央政治局得到上海小组的报告，上海有武装叛乱迹象。当晚8点多钟，召周纯麟到玉泉山5号楼。周刚坐下，李先念就详细地询问了上海警备区兵力部署和上海民兵的情况。接着，他严肃地问：周纯麟，你估计一下，“四人帮”被隔离的消息公布后，他们上海的党羽会出现什么情况？

周纯麟思索了一下，说：“我估计有三种可能，一种是大干，一种是小干，一种是没什么大的问题，比较平静。但是大干的可能性不大。”

李先念追问原因。周说：“因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个人被抓起来后，他们没有打旗的了，在上海有哪一个人能挑头？就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也不行，树不起来。而小干呢，就是他们可能利用一下民兵，把我们警备区的机关冲垮，或把我们上警的几个领导同志抓起来。”他稍许停了一会儿，又说：“不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但先决条件是，要尽快地把‘四人帮’的罪行向上海人民群众公布，使群众不再受蒙骗……”

接着，周纯麟又把马天水这几天的表现情况作了汇报。中央领导同志问：“徐景贤、王秀珍能来吗？”

周纯麟说：“中央要他们来，恐怕会来的。”他建议让马天水打电话通知他们。

9日晚上，房佐庭从北京打电话告诉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要他们两人来北京开会，空军会派飞机，情况来了会清楚的。

马天水要徐景贤接电话。徐景贤汇报了下午开会情况。马天水说：“还可以在马路上贴拥护中央决定的大标语，但开大会要等我回来。”

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黄涛、张敬标六个常委开会，研究、估计事态发展的几种可能性。

王少庸等老谋深算，提出：“可能有问题，是否不去人，或者去一个人？”

徐、王商量后说：“这是马老通知的，（我们）两人不去不好，去了一定打电话回来，如果没有电话就是出事了。”

他们决定一起到北京还有一个原因。10日上午，他们看到《人民日报》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社论写道：“历史证明搞垮我们党是不容易的。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批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徐景贤、王秀珍、冯国柱、张敬标分析后错误地认为，可能是有人反对华国锋，而江、张、姚、王是站在华国锋一边的。

徐、王商量去北京后要及时通报消息。最后，他们决定让张家龙随同去北京。

王秀珍说：“我们走后，你们几位就在康平路集体值班，注意各方面的动向，有问题在一起研究。”

徐景贤说：“我们两人去北京开会的消息，在场的人要保密，不要传出去。”

王秀珍马上又打电话给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叶昌明说：“我和徐景贤要去北京开会，你那里不要动，有事要请示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要听他们的指挥。”

徐景贤要王秀珍打电话告诉施尚英，民兵值班，“撤销五位数（即31000人，实际上只有11000人），保持四位数（即2500人），恢复正常”。然后，徐、王与廖祖康谈话，要他撤销东湖的据点。但是，廖并没有撤，一直维持到马、徐、王13日从北京回来。

徐、王10日晚到北京。让他们来北京的时机掌握得恰到好处。如果来早了，马天水的态度未变，三个人沆瀣一气，更难转变。但是如果来晚了，12日外电报道了江青等被捕的消息后，徐、王就不会来了。12日是“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要大干的一天，因马、徐、王都在北京，他们虽然吵闹得很厉害，也没敢行动。

◇ 华国锋要求解除拉练，江苏省委和南京军区的同志先回去

在10月9日晚政治局会议上还解决了一个问题。周纯麟汇报毛泽东逝世后，部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有一个师正在由青浦向上海方向拉练。

华国锋马上说：“马上停止，不能引起误会，逼出事来。要相信上海工农群众，军队一调动，马上就会引起恐慌了。”下令解除拉练后，这支部队很快就回去了。

华国锋深信“四人帮”早已失去人心，即使在上海，广大群众和干部深受他们的欺凌和压迫，对他们的倒行逆施早已不满，一定会奋起反抗。广大民兵是不明真相，一旦“四人帮”下了“打”的命令，他们绝不会听命。他反复讲，一定要将“四人帮”和广大群众分开。现在部队向上海运动，虽然是早已决定的，但是容易造成误会，不利于做上海民兵的工作。

华国锋后来回忆说：我让江苏省委和南京军区的同志先回去。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慢慢由南京传到上海。

10月9日晚上，徐景贤、王秀珍答应到北京开会。华国锋、李先念等又找彭冲等人和南京军区的两位负责人谈了一次。

10日中午，彭冲、廖汉生、丁盛等回到南京。彭冲在省委常委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传达了中央的精神。

10日晚，徐、王到达北京。华国锋决定他们暂不参加政治局的打招呼会议，由马天水、周纯麟向他俩传达“四人帮”被隔离的情况。徐、王却质疑说：“这件事可能是青年人搞的。我们前几天在北京时，还没有听说有这些事，为什么突然把他们（指“四人帮”）一起都抓起来？”

徐景贤见大势已去，不得不谈了10月8日以来他们在上海调动民兵、搞战备部署的情况。接着，徐要求与上海通一次电话，说“可能出事”。经同意后，徐打电话给上海的冯国柱说，第一，他和王秀珍已安全抵京。第二，一切要等我们回来再定。

11日中午，徐、王聚在马天水的房间里开会。周纯麟得知后，立即过去，刚推门进去，他们就不讲话了。徐、王立即起身走开，马天水赶忙招呼周纯麟坐下。

徐景贤的表态是一时冲动，他并不甘心。不一会儿，房佐庭到王秀珍房间送文件，徐景贤跟着也进来了。

王秀珍向房佐庭说：“毛主席逝世不到一个月呀，怎么一下子被他们搞起来了？是怎么回事啦！老房，你在马老身边几天了，马老是怎么想的？”

房佐庭讲了马在中央表态的情况。

徐景贤说：“同意他们的会议精神，就是同意和平演变啊！”

王秀珍说徐景贤：“你怎么把调动民兵、分两个点的情况对周司令也说了，不能对他说的，周司令是党中央安排在我们市委那里的一支钉子。”

11日下午2时左右，中央再次派陈锡联、苏振华、倪志福来到京西宾馆会议楼，找周纯麟和马天水谈话。周纯麟汇报了徐、王的情况。马天水谈了10日深夜徐、王提的一些问题。回来后，周纯麟和马天水立即向徐、王转达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内容。

12日，马、徐、王都坐不住了。因为一连三天不让他们参加政治局会议，不知中央会如何处理他们。他们通过在京西宾馆几天的观察，看到全国各省市来参加会议的都热烈拥护中央的决定，明白大势已去，此时再搞武装叛乱，无疑是螳臂当车，自取灭亡，因而担心上海出事。如果上海真的发生武装叛乱，他们罪孽深重，难逃法网重罚。另外，他们内心不肯接受“四人帮”被隔离的事实，希望看到更多的材料，要为他们当面向中央辩解。

◇ 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向上海派中央工作组

10月12日上午，华国锋在玉泉山5号楼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工作组的人选。

华国锋说：现在看来，上海市委这些人已无法工作了。他们顽固地站在“四人帮”立场上，与党中央对抗，妄图发动武装叛乱；过去被“四人帮”压下去的一派也准备搞串联；上海的群众也自发地起来了，需要正确的引导，中央应马上派人去接管上海，不然会出大乱子。

倪志福对这次会议印象深刻。20世纪80年代，他详细回忆了这次会议。

在会上，叶剑英成竹在胸地说：我赞成国锋同志的意见，为了防止上海这些人狗急跳墙，搞武装叛乱，要派一位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地方，都能压得住台的老同志去。

叶剑英停了停，略一思忖后说：我看振华同志堪当此重任。他资格老，林彪、“四人帮”整他很惨，但他斗争很坚决，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时刻，起了重要作用。在战争年代，有指挥作战的丰富经验；在建国初期，担任过贵州省委书记，多次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再说，上海有海军东海舰队的基地，苏振华去上海，工作起来也有方便条件。

陈锡联、李先念随后表示同意叶剑英的意见。

华国锋接着说：我赞成叶帅的提名。根据“四人帮”控制上海的实际情况，中央去接管上海的人选，最好是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能够取代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职务的人。“四人帮”和他们的余党不是说王洪文是工人阶级的“领袖”吗？他是什么工人阶级“领袖”！我们要派一位真正的工人阶级领袖去，我看志福同志也一起去上海。

李先念、叶剑英等表示同意。华国锋说：过去上海和江苏的矛盾很尖锐，但上海和江苏不论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关系都很密切，最好能从江苏调一位同志去上海工作。

李先念说：可以派彭冲同志去，他处事从容稳重，在江苏政绩突出，“四人帮”往死里整他。他跟“四人帮”斗争非常坚决，他去接管上海，有利于解决两地矛盾，上海经济建设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将会得到江苏的有力支援和帮助。

中央其他领导也都同意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一起去接管上海。

12日，中央政治局决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组建中央工作组，并急电命令彭冲进京。

一切安排妥当，华国锋才决定召见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

1985年，华国锋回忆：“上海的工人就是好，不听他们的。等我们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去，他们已经控制不了局面。这时中央已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同志到上海。上海有东海舰队，苏振华是海军政委，调动海军方便。倪志福是上海人，对上海熟悉。天安门事件最早在南京发生的。彭冲是江苏省委书记，顶‘四人帮’坚决。上海有困难可以就近得到江苏的支持。严佑民我早在1975年就认识，我到公安部提出要解放几个副部长，他就是其中之一。这是由政治局决定，由大家提的名。谁提的谁，我已记不清了。”华国锋十分谦逊，不愿意过多谈自己，因而说“谁提的谁，我已记不清了”。

◇ 中央政治局再做工作，徐景贤、王秀珍交代问题

1976年10月12日晚10时，华国锋、叶剑英和陈锡联、纪登奎、吴德、汪东兴、苏振华、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等接见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一直谈到13日凌晨1时30分。李先念因劳累没有参加。

华国锋要马天水先谈谈。马天水汇报了几天来的思想认识过程，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的果断措施。

华国锋拿出张春桥的《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的影印件，给了周纯麟、马天水等人每人一份，对徐景贤说：你给大家念一遍。

徐景贤看了确实是张春桥的手迹，哑口无言。张春桥在《有感》中把政治局多数同志叫“他们”，把“四人帮”叫我们，阵线划得清楚，公开要分裂党。

陈永贵、吴德、吴桂贤介绍“四人帮”反对周恩来的具体情况。马天水等人都说，真没想到他们这样对待总理，在我们面前他们装得很尊重总理。

华国锋介绍江青控制主席处的文件，把江青改过的两个讲话文件给他们看。他还详细介绍了毛泽东逝世前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大闹政治局的事。华国锋说：摇鹅毛扇的是张春桥，这份《有感》是他的总思想，“又是一个一号文件”，他恨主席恨得很。

叶剑英说：上海是受蒙蔽、受封锁的。主席讲，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你们这次来了，情况就明了。张春桥的《有感》里，把阵线划得很清楚，“他们”“我们”，搞宗派历来是反党分子的做法。

华国锋说：主席不但想打烂“四人帮”，而且还怕把新同志拉进去，所以在陈永贵同志报告上批了“钓鱼台没有鱼”。

华国锋介绍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然后说：我们不会采取“四人帮”对别人的办法，乱戴帽子，乱整人。有错误改了就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按毛主席的路线，以实践来检验，只要转变立场，我们是欢迎的。揭发批判，我们欢迎。有些材料要保存好。你们一时思想转变不过来，是可以理解的。廖祖康、肖木（王洪文秘书），要来京办学习班，他们是青年，

要帮助改正错误，我们相信你们能搞得更好。“四人帮”解决了，全国的形势就会更好，你们过去对外省点名批评，但这次江苏对上海没有提意见。经济上我们一定安排好，煤、铁的供应决不能减少。对于“好八连”以及其他基层同志的努力，都要肯定，不要因为某某送过什么东西，就否定他们，要区别开来，群众是好的。

中央领导同志问马天水等人：你们过去听说过“四人帮”吗？

马天水等人回答，从来没有听说过。

◇ 徐景贤、王秀珍交代问题，武装叛乱胎死腹中

周纯麟、马天水都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果断措施。

徐、王向中央领导汇报了这次来北京前，在上海和军队的几位同志会合在一起，还调动了民兵，准备决一死战。现在了解了这几个人原来是篡党夺权的“四人帮”，感到极大的义愤，并表示坚决和他们划清界限，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华国锋笑着说：你们回去别人会骂你们是叛徒！你们把立场转变过来，就要振作精神，做好工作。

随着马、徐、王态度的转变，会议气氛渐渐变得和缓。散会时，周纯麟、马天水等三人同政治局同志一一握手告别。到了京西宾馆，王秀珍后悔没有交代调动民兵数字的问题。第二天一早她找到了会议上负责记录的同志，告诉了上海调动民兵的数字，请补到记录里去。

中央责成他们回上海，向干部群众传达中央的精神并表明自己的态度。

1977年1月6日，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在打招呼会议上，马天水听了我的谈话以后，他说：说服力不够。我们拿出《二月三日有感》，他受震动了。张春桥的《有感》到底矛头指向谁？指向毛主席嘛！16号文件中把毛主席批他们的话用了好几段就有力量。江青不总是代表毛主席身份出现吗？我们就用毛主席的话揭露她。毛主席说，她不代表毛主席。我们就用毛主席批示揭露“四人帮”。作用是大的，所以我们取得了胜利。

1976年10月13日上午，在王一平、徐良图安排下，曹大澄用军用电话报告了上海要在13日发动叛乱的消息。华国锋、叶剑英接到报告后，当即（13日上午9点）派专机把周纯麟、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送回上海，使王洪文余党策划的武装叛乱胎死腹中。

在飞机上，周纯麟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说：一、回上海后，立即通知市属各大单位，说明“四人帮”被隔离了的事情是确切的；二、市委马上按中央指示办，逐层传达打招呼会议精神；三、各单位照常工作，不准任何人搞破坏；四、各级领导干部要听中央的话，一切听中央指挥。这四条，要由他们三人亲自给各有关单位打招呼。

上午10时多，马、徐、王垂头丧气地下了飞机。只有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来迎接，警备区没有派车接周纯麟，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通知警备区。

他们提出要到丁香花园（当时市委会议场所之一）去开会。周纯麟感到，此时最要紧的事是要尽快掌握部队情况，坚持要先回家。一到家，周纯麟立即把政委请来，询问部队情况。政

委说，南京军区已传达了粉碎“四人帮”的情况，警备区部队已按南京军区的指示，作了调整和部署。周纯麟紧张的心情才有所缓和。

到丁香花园后，马、徐、王向其他人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徐景贤拿出毛泽东给华国锋的几张亲笔批示影印件给张敬标、冯国柱、王少庸看。张敬标把毛泽东的批示“你办事，我放心”往沙发前茶几上一摔，用手拍打着说：“我以为你们带回来什么重磅炮弹响！原来是这几张东西，上面又没头没尾的，谁拿到了都可以用嘛！”

徐景贤说：“这是毛主席的手迹。”

张敬标说：“谁知道是真是假，凭这么几张东西就可以宣布人家反党了？！”说到头天晚上造反派大闹的事情，他边哭边说：“我们老头子反正年纪大了，死了没有什么……你们说服得了他们？革命革到现在，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弄成这样的下场，培养一批青年干部不容易，他们革命热情非常高。”

冯国柱也边哭边说：“自从你们走后，各路情况摸下来都是传四个人被抓起来了，警备区的几个人从南京军区开会回来也不敢来找市委了；总工会、写作组的人都要起来干，逼着市委表态，而你们在北京不断来电话要家里稳住，一切等你们回来再说。弄得几个在家的人两头受夹，度日如年啊！”

13日下午，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锦江饭店14楼召开市委常委和列席常委（指王洪文的余党）会议。马天水通报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情况。徐景贤作补充，讲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然后表态。王秀珍也表态，说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认识有所转变。还没等他们讲完，会场就大闹起来。

13日晚8时，马天水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集市相关单位头头会议，继续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主要精神。会场内议论纷纷。

◇ 华国锋说：应该支持上海的工人

10月14日清晨，上海不少公共车辆上已被写上“打倒四人帮”“打倒王、张、江、姚”的大字标语，行驶在各条交通线上。

14日，在延安中路200号召开区、县、团、局和大专院校的负责人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当宣布“四人帮”已被隔离时，到会的绝大多数同志情绪高昂，只有少数的人闷坐着，不吭声，还想搞一些“合法”斗争。

下午，“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陆续传达到群众。群众立即沸腾起来了。机关、学校、工厂贴出各种声讨大字报并迅速蔓延到街头。一支支自发的游行队伍出现在大街上。上海人民对“四人帮”的深仇大恨转化为各种声讨行动。愤怒的群众游行队伍一层一层地包围徐家汇、康平路市委机关办公大院（楼）。

上海交通大学师生员工走在最前面，首先到康平路刷大标语：“砸烂反革命黑窝！”“揪出反革命的帮凶！”“清除四害，斩草除根！”他们还迫使徐景贤走出机关大院，接受师生们递交的抗议书，并要他转告马天水、王秀珍，要好好检举、坦白、交代！

各级干部积极传达，不仅在上海传播，还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主动传到外地。15日上

海“长自轮”领导听到打招呼会议的消息，16日传达给船员，当天下午起锚，开船去大连，17日晚在船上传达给48个旅客，旅客无不兴奋。当晚，100多名船员、旅客召开声讨大会，悬挂打倒“四人帮”的大幅标语。当时，辽宁省迟迟不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大连的群众还不知道粉碎“四人帮”的消息。18日深夜2时许，“长自轮”到达大连港，因挂有粉碎“四人帮”的标语，港监不让进港。“长自轮”将此情况报告上海远洋局。很快，大连港监上了船，气势汹汹地说：没有信号不能进港。船上用无线电话再三联系。旅大市委命令：叫你们政委下来。船上同志召开支委会，认为问题大，没有让政委上岸交涉。旅大市委第二次又命令：一、不准进港。二、撕下大字报，自己与上海联系。三、给旅客做工作。四、接受地方党委领导，否则犯错误。船上领导研究后，决定给中央、交通部写报告，再增加三幅拥护中央决定的标语。

“长自轮”的报告很快到了华国锋那里。华国锋说：应该支持上海的工人。

8点20分，大连港接交通部的通知，准许“长自轮”进港。

因大连欺骗群众，双方僵持了6个多小时，船员大怒，一上岸，拿着糨糊桶到处贴大标语，刷到13辆汽车上。“打倒‘四人帮’”“打倒毛远新”的标语一直刷到旅大市委。4个便衣警察一直跟着船员，但是不敢行动。

华国锋高兴地说：“上海人民知道粉碎‘四人帮’的时间早，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愤恨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这实在好啊！这个消息实在好啊！我听了实在高兴，这些工人实在好。向上海工人阶级学习。”

◇ 解决上海问题的方针：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

10月13日，彭冲应召入京。当晚，华国锋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解决上海问题的方针：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

华国锋说：“就以上海来说，‘四人帮’经营十年之久，我们原来准备那里可能出一点大的乱子。但是实际上，揪出‘四人帮’的消息一传开，‘四人帮’及其一小撮余党就陷入上海1000万军民揭批‘四人帮’的汪洋大海之中。革命群众意气风发，社会秩序稳定，工业生产逐日上升，大的乱子没有出，中的乱子没有出，小的乱子也没有出。”“中央工作组到上海以后，就是抓好揭批‘四人帮’的阶级斗争，千万不要钻到具体事务里去。具体事务让上海市原来的有关职能机构去搞。如果有人乘机搞乱，破坏生产，破坏革命，你们查他们就是了。”华国锋嘱咐：“你们去了以后要注意，生产不要受影响，要控制住局面。”

事后，华国锋说：我们政治局的同志不多，到上海去了两位，又从南京调了彭冲同志，这表示政治局的决心。

华国锋对彭冲说：“你这次去，要有个长期打算。”

李先念提醒彭冲：“你到上海去，上海有些人会眼红的，同你是对头冤家嘛！这一点不要紧。但自己要注意一点，不要带江苏的人去。”

彭冲很重视李先念的这条意见，没有从江苏带干部去，在担任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以后，也不管干部工作，从不对干部的安排或提拔提出个人意见，一切集体解决。

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这些讲话集中反映在1976年10月18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中。《通知》在列举了“四人帮”的罪证后，首先指出：“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然后指出：在揭发和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中，要注意政策。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要切实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对犯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受了“四人帮”的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又有极少数人是跟着“四人帮”干坏事，陷得很深的。要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改了就好。不要揪住不放，不要纠缠历史的旧账，不要一棍子打死。中央热烈希望，跟随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尽快觉悟过来，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划清界限，揭发他们的罪行，转变自己的立场，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 原载《党史博览》2014年第1期

~~~~~

### 【亲历者言】

#### 保健护士谈江青的饮食起居

• 周淑英 • 赵柳恩 •

周淑英，女，1945年生，1967年10月—1971年11月任江青保健护士

赵柳恩，女，1948年生，1971年1月—1974年12月任江青保健护士

主持人：郑仲兵、李宇锋

参加者：阎长贵、杨银禄、张云生

时间：2005年3月23日

周淑英、赵柳恩（以下简称周、赵）：文革期间我们都曾任江青的保健护士，除了负责她的医疗保健外，她的衣、食、住、行等等都离不开护士。那段时间我们与她朝夕相处。

我们和她怎么个接触法？可谓是“紧密接触”。就是她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这套全部管。包括她服的每一粒药、打的每一支针、吃的每一顿饭、喝的每一杯水、穿的从内到外每件衣服，全部都要经过我们的手。特别是她吃完安眠药进卧室，每次都得扶着她走。我们搂着她的腰，她胳膊搭在我们的肩上以防跌撞。就这种接触，就这么近，紧密。医疗护理和日常生活的事，我们全部负责。

时间过去几十年了，那段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日子仍记忆犹新。这么多年来，我们都不愿意接受采访和写回忆文章。一是往事不堪回首，这些回忆会让我们身心不快。在粉碎“四人帮”江青受到正义审判后，我们精神状态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过去接受的保密教育使我们不想和外界多接触，也不想谈这些往事，担心掌握不好分寸，所以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此外，个别媒体和作者不尊重事实的演绎和炒作，也是我们将一切采访拒之门外的原因。江青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人物，涉及她的文章和专著已发表不少，但其中有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以致以讹传讹。如今，我们这些曾在江青身边工作过的人都已进入老年。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回忆往事，将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之事客观地记述下来，为今后研究这段历史提供素材，这是件有意义的事情。现在我们感到有必要也愿意敞开心扉来谈那几十年前所经历的事情了。

郑仲兵（以下简称郑）：完全理解你们的顾虑，也感谢你们的信任！我们保证最终发表的文章一定经过你们二位受访人确认无误。

#### ◇ 初识江青

李宇锋（以下简称李）：你们为江青做护理工作之前，有思想准备吗？

赵、周：我们来楼里时，有关领导及同行前辈就交代说，江青因为一些疾病，曾在国内及苏联进行了一系列检查治疗，之后出现了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内分泌失调，易眩晕、出汗等。因此对她的护理具有特殊性，如说话的声音大小和语速要适中；走路要轻，不能带风；不同季节室内温度都要求严格；还有出汗时如何换衣服等等，讲得非常认真详细，生怕遗漏一个环节。

周：前任护士带着我，她工作细致、动作灵巧。这些多是平时没见过的特殊护理要求，教科书中也没讲过，难度很大。我一度提出，自己胜任不了这份工作，还是让我走吧。领导让我服从组织安排，边干边学。我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了这个工作岗位。

李：记得您说过，在江青身边工作和在外边是“两个世界”，您能具体讲讲怎么个不一样吗？

周：那时期江青的形象经常出现在电影、电视和报刊上，可近距离见到她本人后，感到反差很大。我第一次看到她是在钓鱼台 11 号楼的二层，那天她在走廊散步。我在拐角处远远地望去：一个身材修长，穿着黑灰色束腰长衣的女人，被人搀扶着，在紫红色的地毯上踱步。走廊每隔十几米就有一把扶手椅，每走到椅子处都要靠坐一会儿，用白色小毛巾擦头发。她肤色白而微黄，没戴眼镜，头发散乱。——这就是我的第一印象（以致我在几十年以来，有时梦中情景常是在铺着红地毯的走廊里，她身着黑睡衣，飘飘地就这么走来了……我往往是在她咬着门齿紧闭双唇的怒容和斥责声中惊醒，情绪难以平复）。

进一步再接触，我发现她连起床、更衣等日常生活都不动手。我刚到楼里的时候，是不能直接为她服务的，也不能马上见到她。前任护士做，让我通过门缝往里看（这是见习）：见到连扣子都是护士给她一颗一颗扣，她自己是一点都不动手！再加上经常无事生非地发脾气，又狠又凶！这与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戴着墨镜、身着军装、手举毛主席语录微笑点头的江青真是判若云泥……

李：怎么听着有疹人的感觉，或者叫“鬼气森森”？

赵：接触江青后，我就是精神紧张，身上也发紧，是那种根本无法放松的感觉。

周：不少接触过江青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有人甚至紧张得发抖，这些放在后面说。当时在全国红海洋形势下，人们手举红宝书口念最高指示，面对毛主席像作早请示晚汇报。而这里工作人员并没被要求这样做，开会时简单说几件事，然后赶紧忙自己的工作了。有次江青在大会堂乘电梯，眯眼靠坐在椅子上。开电梯的服务员念了“下定决心……去争取胜利”。江青被惊着了，气愤地说：“岂有此理！竟然对着我念主席语录！”从此再也没发生过类似的事（不过江青外出穿的衣服口袋里总有一本毛主席语录，换洗外衣时，我们必须帮她放好）。我当时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外面和楼里情形大不一样。

我先后三次经历了江青下令捕人的事件。第一次是刚到钓鱼台 11 号楼不久，就目睹了阎秘书被江青陷害的经过。江青凶神恶煞般地罗列了强加给老阎的罪名，硬说他偷了保险柜的钥匙，不容申辩就押出 11 号楼。有一个细节给我触动特别深。事发前阎嫂来京探亲，老阎曾找

我借了十元钱。就在他身陷囹圄时还不忘托看守辗转还我钱——这是多么实诚的人啊！我得知阎嫂和几岁大的孩子也被隔离看管了，老阎被投入秦城监狱。想想他老家的老父亲老母亲和孩子有多么凄惨！我躲到值班室看着这张钞票暗暗流泪。

此后，我又不断见识江青的厉害。比如，1968年的杨余傅事件。在钓鱼台16号楼，我亲历了傅崇碧和他的秘书遭江青当面诬陷、训斥的经过。江青声色俱厉，硬说因公并被批准进入钓鱼台的傅崇碧是“武装冲击钓鱼台”。傅的秘书由于紧张、惊恐昏倒在地，手提包也掉在地上。江青硬说这位秘书要用皮包打她，皮包中还有手枪。江青一句话就是一纸逮捕令，而蒙冤者无处伸冤、无处讲理，后来傅崇碧和秘书都受到迫害。

在杨成武出事前不久，江青还在吴法宪的陪同下去过杨家，那次可是和和气气的。在门厅，她说“见见孩子们”，在家的孩子都见了，她还微笑着摸摸孩子们的头说“娃娃真可爱”。没过几天，在杨成武被抓后，我亲眼看到，同一个江青，坐在住所11号楼楼梯拐角处，咬着牙说：“光抓他不行，他家还有大儿大女呢，都给我抓起来！”那年我才22岁，真是被当时的场面吓得发抖——这变脸可真快啊！杨家这些孩子何罪之有？江青的变脸使我感到她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

赵：我去之前是一点都不知道“厉害”。你想啊，我是1969年4月才从边远的桂林（解放军一八一医院）调来北京（解放军三零五医院），不久又下到北京外语学院支左，又跟去了农场，一直在下边，从来就没有近距离接触过江青那样的大领导。虽然调去之前有点紧张，但是，因为以前没听说过任何关于江青的议论，就没有任何畏难心理，而且当时她那个身份、那个地位，能去那里工作，多少也有点高兴。

先是张耀祠局长跟我打过招呼，后汪东兴主任正式谈话。汪主任交待，在那里工作，一个是保密纪律，有些看到的、听到的，一辈子都不能说，要烂在肚子里；一个是遇到一些事情要能忍，要顾大局，“要永远做一个不倒翁”（这句是他的原话）。他当然了解她的情况了。

江青对我的第一印象还可以。据带我去见她的杨银禄秘书事后告诉我，江青认为我“说话语速还适中，人也比较温柔、文静”。其实那次见面很简单，杨银禄先介绍，“江青同志，咱们来个小护士，你看看。”她从三四个台阶上下来，我说“首长好”，她说：“以后不要叫‘首长’，叫‘江青同志’。”我说，好。“什么地方的人啊？”我说广西人。别的还说了什么，不记得了。总之，算过了老太太的关了，她要是不满意你肯定是开路走人。

我去的时候还有个插曲。汪主任后来告诉我，他向主席汇报江青那里调来个新护士，主席问是“哪里人”，他回答“广西人”，主席说：“广西人好，广西人会打仗。”我当然知道主席不是说我会打仗，估计是白崇禧、韦国清这些人给他的印象太深了。

我真正直接为她服务是一年以后了，这之前一直是周淑英带我“见习”，打打下手，帮助叠被子，开窗通风，洗衣服什么的。有时候，周淑英为她服务，我就站在一边看。为什么呢？江青有这么个习惯，身边有个熟人以后她永远不愿意用新人，新人使她老觉得紧张。有一天，她不高兴了，训斥我：“你站的不是位置，让我紧张、出汗了知道吗！”从这时起，我才逐步感受到在她身边工作那种动辄得咎的压力。

#### ◇ 容貌、称谓、起居饮食——“生活江青”

李：请您二位具体讲讲，生活中的江青，或者说“生活江青”有什么特点？

周：我们为她服务的时候，江青已经五十多岁了，可头发依然乌黑浓密有光泽（据她说得益于母亲的遗传）。她身材修长，皮肤白皙（她的皮肤属油性，弹性比较好）；大眼睛双眼皮，鼻梁比较直，鼻尖右侧有一颗突出粉褐色的痣，左下颌有颗长毛的黑痣。除下巴略显松弛外，没有明显皱纹；门齿稍向外凸，平时抿着嘴唇，发怒时咬紧门齿双唇紧闭。（全楼的人都知道这是个坏的信号，江青要发脾气整人了，不知道楼内外谁又该倒霉了！）她手指细长，让人感到这是一双多年保养很好的手。

赵：江青体重保持在一百零几斤，一米六六的个儿，身材相当好。她从来不化妆，没有化妆品，用的牙粉、擦脸油都是中南海门诊部药房配制的，没有任何刺激性。

我们为她服务，她要求我们一律称她“江青同志”。新来的人第一次和她见面，如果称她为“首长”，她会纠正：“以后不要叫我首长，叫我‘江青同志’。”我们当面都称她“江青同志”，但后来在背后都称她“老太婆”。

周：有一次，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的一位演员称江青为“江老”，江青很不高兴，脸一下就沉下来了。回到住处她很气愤地说：“齐××竟然叫我‘江老’，难道我真的有这么老吗？真是莫名其妙！”

赵：你问“生活江青”，咱们就从她的起居讲起。

虽然她的起居不是像普通人那样正常，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很讲究。每天在江青起床之前，我们要到外面大树底下看挂在树上的温度表，观察树梢动向，风向以及风力。呼叫护士的两声铃响后，全楼人各司其事都行动起来了。护士进了她卧室，先把紫色丝绒窗帘掀开一个缝，留一层白色绸纱帘在里边，这样光线柔和，既有点亮，也不能让强光刺激她。“江青同志晚上睡得好吗？”这是江青每天起床，护士例行公事必须说的问候话。她会说，“唉，马马虎虎”，或“没睡好”、“老做梦”。接下来我要报告天气情况，然后双手搂她的肩，她抱着我的脖子，我借这个劲儿把她抱起来……

李：抱起来？

赵：对，她躺在床上，我得抱她坐起来，赶紧把大睡衣从后面绕过去给她穿上并系好腰带。再往她身后放上个大鸭绒靠垫，她就靠到后面的靠枕上。先喝一杯浓的龙井茶，这是她早上起来第一步。

然后吃苹果。她吃的是绿色皮的印度苹果（国产的），一天一个。护士都给她削好切成块儿，放在一个杯子里面，放上叉子，再倒上温水（她从来不吃凉水果），她得慢慢地把这个苹果吃了。我们就给她去拿麦片粥，美国产的那个老头牌的麦片。我记得那个盒子上图案是个戴卷发头套的老头，我问过程师傅，他说是“老头牌”的。麦片再加了鲜奶油、鸡蛋清和水（蛋黄她从来不吃），搅和煮成粥。早上起来就吃这么一碗麦片粥。

阎长贵：说到凉水果她不吃，冰镇的西瓜她也不吃，要吃就要用锅蒸一蒸。1967年“七·一”党的生日时，主席在游泳池请工作人员吃饭，江青就这样吃西瓜，当时我感到很奇怪，因为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

赵：她起来以后坐在床边，我们就给她把里外睡衣全部都脱掉，再一件件帮她穿上日常衣服。给她穿袜子穿鞋包括系鞋带。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全是护士给穿脱，这一点都不夸张的。有

时午睡仅躺一会儿也是这个程序。

她为什么要用护士呢？最合算。医疗方面的护理是护士管，生活上也是护士管，她就是不想那么多人，她见人多了出汗，她紧张。

周：她曾说过：“我就用一个秘书、一个警卫、一个护士，我这样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我一个人工作，你们那么多人跟我转还转不过来么？你们得跟上我的步伐。我不像总理那样，用那么多人。”听得我挺生气的，总理是多大的工作量啊！而且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超负荷地工作。

赵：我们在那儿干一年，就没有一天休息，天天都在忙碌。她希望给她服务的护士必须没有家，全身心地投入到她这儿。24小时两个护士都忙的团团转，一个护士根本忙不过来。因为上班这个护士，要跟着她片刻不能离开。下班那个就得给她洗熨衣服、整理房间、准备药啊，或者是给她去取药……

我刚去的时候还挺壮的，有100斤左右，后来就瘦成80斤了。怎么造成护士这么累啊？就说吃饭吧，值班那天，我们没有去食堂吃饭的时间，饭都是别的工作人员帮着打回来的，打回来什么就吃什么。一两饭，路还挺远，打回来以后就凉了，用开水一倒，就成泡饭。就这样。刚吃上一口，铃响了，一声叫秘书、两声叫护士、三声叫警卫。她叫护士都是些什么事呢？“我的笔掉地下了”，捡起来给她；又打铃，“裁纸刀又找不着了”，你给她找；再打铃，“我的铅笔怎么没有啦”、“我出汗了”……反反复复的小事。这一弄，这顿饭吃八次你也吃不完。为什么呢？一倒上水以后她叫你了，回来以后又凉了，又倒上水泡一会儿，又吃两口，就这样一天要吃上一两饭就很不简单。这种经历导致我离开她很长时间后，一听到铃声还会紧张。

杨：我最怕这个铃声了。

赵：护士不仅吃不好饭，觉也睡不好，甚至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1974年她搞批林批孔那阵，曾连续五天我没怎么睡觉，晕头转向。到了大会堂，她开会我就坐福建厅外面犯困。那些工作人员都知道，江青的护士、警卫，在大会堂都是坐楼梯台阶上守候着不敢离开。我们要按时准备给她吃药，随时伺候她换衣服，熨衣服等等。再疲劳也得准备在她招呼时随时出现在她面前。晚上11点钟以后食堂有夜餐，可是我们都不能去，都是别人帮打回来，坐在那台阶上吃。有时候还没吃两口，“江青出来啦！”我们把碗往旁边一推，就赶紧跑出去了。不是她身边的人全部躲到屏风后面去，包括原来警卫局的那些老局长，统统都躲到屏风后面，谁也不敢出来，只要她出现没人敢在外面露面。

周：长期的紧张、失眠使我和小赵经常出现头痛，有时头痛剧烈还伴有恶心呕吐。口袋里总得带着止痛药。这病痛伴随我们也几十年了。让我一生都难忘的一想起来就激动的是周总理！总理最理解和体谅我们：都是年轻人哪，实在太疲劳了！总理怕我们挨尅，往往在散会以前，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早出来几分钟，提醒大家：“马上散会了，清醒清醒啦！”顿时大家起立做好准备，我们赶紧站在会议厅门口迎候江青，今天就算安全过一关。如果她出来没看到我们会发火的。大家都感到总理在百忙之中的一句提醒是何等重要啊！

散会以后，江青回来还要看电影。她一边看电影，我们还得给她全身按摩，做指压穴位疗法，让她放松以利入睡。

赵：她睡觉那套程序特别复杂。首先是按时服用安眠药。她是从晚上七点开始吃非那根一类作用轻微的药，诱导她慢慢地镇静；小量分次给药，直到她临睡觉前，开始吃巴比妥类的药



了。她一般都是夜里两三点钟睡觉。

赵、周：我们这里强调一下，她吃的药不是我们护士定的，是由一个医疗专家组研究商定的。每天虽然服用次数很多，但每次的量并不大，胶囊里有赋形剂成分填充。

赵：她吃药讲究多，水合氯醛里边还加上果汁（不成果汁很难吃啊），必须在睡觉前吃，而且还得吃温的。可她每天睡觉前蹲马桶的时间长短不一定，就得不断加温，保证随时是温的。

她晚上睡觉之前要进卫生间坐在马桶上，看一下《参考资料》、《国际共运》一类材料，这时护士给她洗脚。对洗漱用水的温度也有要求，护士事先给她兑好了。洗漱完毕从卫生间出来，她就要穿上丝棉的大袍，坐在一个特制的沙发上。沙发中间挖了个洞，底下放便盆，坐在上面解手。前面还有一个大沙发，厚厚的大海绵，她往上一趴。如果是她今天不愉快或心中有事，睡不好觉，稍微在那儿趴一会儿就起来了；如果那天她没什么事，她就在沙发上睡着了。这一觉她横竖从三点多钟能睡到早上，有时睡到上午九点。我就一直在那儿这么坐着，一直坐到上午九点，不敢叫她。不能叫她，绝对不能叫！有一次我得了感冒，咽部发痒怎么也憋不住，就咳了一声，她歪过头：“你故意的啊？”我说没有，我感冒了。“感冒为什么不吃药？故意吵我。”我只好尽量地憋着不咳嗽，就这样的事情我们经常遇到。

李：刷牙洗脸是她自己来吗？

赵：刷牙、洗脸是她自己做。但是毛巾是我们给她拧的热毛巾，她自己擦。小周在的时候每天晚上还给她做口腔护理。

周：她牙周发炎，请301医院口腔科洪民、曹家信两位主任来医治。治疗一段时间疗效很好，江青就让我跟着他们学习。近两个月的医治，拔除了病牙，牙周炎症已消退，她就让医生回去了。为巩固疗效，江青叫我每晚为她冲洗牙周清洁口腔，防止炎症复发。几年下来每天如此，她再没发生过牙周炎症。

赵：最后她上床睡觉的时候，要把外边的衣服一件一件地脱，再穿上睡衣。她要躺下的时候也是给她抱着下去，把她的睡衣往下抻平（她穿的是过去苏联时期的那种布拉吉里面的那个衬裙，很长的那种睡衣，真丝的），两边被子都得给她掖好。她是根据天气和气候用被子，不用厚被，只用薄薄的丝棉被。比如说天气冷了，加一床毛巾被，如果再冷一点，再加上一条短毛巾被。如果加减被子不合适，她感到热或凉了就会拿护士问罪。根据天气应该穿什么衣服，护士就给她增减。所以她的衣服全部是我们管的。

周：她经常说“我是一个高级的脑力劳动者，这些事我是不要动脑筋的”。所以如果吃饭多点了，有些打嗝，她会边用牙签剔牙边说“怎么不提醒我呢？我吃饭是在想着事情呢，脑子根本不是在吃饭上”。这吃饭多少的事别人怎么提醒啊？

赵：还包括提醒她上厕所。到人民大会堂去开会，钓鱼台到大会堂有多远？而且一路是绿灯，你说能有多长时间？可走之前要不提醒她上卫生间，这可坏了！在车上一路骂你，一直骂到人民大会堂。后来没办法，车上准备便盆，随时解小便。有时还要在车上换衣服，每当这时候她让升起车厢中间的隔音玻璃，还叮嘱前排人不要回头、不要看反光镜。

周：我说说江青的饮食。负责给她做饭的是程汝明师傅。程师傅为毛主席和江青服务了二十多年，其间有十多年专门为江青做饭，对她的秉性和饮食习惯了如指掌。除了江青提出要求，平日食物都是由程师傅安排。每顿一荤、一素、一汤。江青喜欢吃鱼、虾、蟹、童子鸡，蔬菜

中菠菜泥经常吃。

赵：我们工作人员戏称她“菠菜泥吃不厌，《红菱艳》看不厌”。

周：主食上她吃面食比米饭要多些。江青也喜欢西餐，如罗宋汤、奶油起酥、苹果派、烤鲑鱼、煎牛排等。程师傅专业水平相当高，工作又认真负责，做饭注意营养搭配合理，中西餐兼顾。他不用味精，保持食物天然味道，菜肴精致，讲究卫生，很适合江青的口味，而且饭菜量都很合适，基本不浪费。有时她肠道不畅就增加些奶油和粗纤维食物来调节。程师傅做的饭菜江青是满意和适应的，而吃其他师傅做的饭往往会消化不良。因此在大会堂开会要就餐时，经常是程师傅亲自上灶或电话遥控大会堂师傅。

说到程师傅，我得多说几句。他为人正直、坦诚、宽厚，处事稳重，是非分明，是大家的主心骨。我们遇到难事、受了委屈都愿意向他倾述，寻求帮助。他总是像老大哥般地劝慰开导人，常出主意帮人摆脱困境，而且能仗义执言。1974年我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程师傅得到消息，就利用上午为江青取菜的机会和内勤小王带着苹果来到我家。他们语重心长地劝导我，可谓患难见真情。当程师傅讲到江青等四个人利用批孔、批儒，锋芒指向周总理时十分愤慨，我们当时都对总理的身体状况感到心痛和担忧。

#### ◇ 江青的几怕

李：我们都知道江青有几怕，这些“怕”，大概很多都涉及护士的工作范围，开始您二位也提到对江青护理的“特殊性”，请具体谈谈。

赵：首先是怕风。江青特别容易出汗，她有时棉袄和内衣都湿透，头发也经常湿漉漉的，要经常换衣服和帽子内沿，有时候在大会堂开一次会得换几身内衣，因此她特别怕风（这一点以前我不大理解，现在年纪大了，知道好出汗的老年人真不能吹风）。平时只要一出楼门，就全身穿戴得很严实，还用毛巾捂紧口鼻，而且是背向门口倒退着出去，就是怕风吹。她经常说“针大的孔斗大的风”。在室内，她就让人举着一根点燃的香，看烟路是一直向上，还是拐弯，来证明屋内是否有风。一旦烟散开，她会说“肯定有‘贼风’”，就训斥工作人员“杀人不用刀，给我制造感冒，起了阶级敌人起不到的作用，这是软刀子杀人！”

周：有一次她找让“贼风”哪来的，我举着燃香，把房间都检查了一遍，四层密封窗哪会进风啊！我想烟路向上散开是正常物理现象，可面对她无事生非又不能反驳。只好解释说：“您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感觉到有风？”没想到她勃然大怒，抓起小桌上一把剪信封的剪刀扔向我！

赵：但是她的房间还要很新鲜的空气。怎么保持新鲜呢？比如她在某个房间呆够一段时间以后换房间，这间你给她通风，打开窗户，进新鲜空气，通完风后把窗门都关上，还要保持规定的温度。

江青再就是怕声音。我们说话要站在她的斜前方，靠近说话你就必须蹲下来，不能高于她的水平视线。她要求我们说话要慢，声音要适中，走路时不能有衣服摩擦声，脚步要轻，不能带风，否则她就出汗。

周：要是一点声音都没有也不行，如果突然发现身边有人，她也会紧张。所以我们进她的房间时，要有一点轻微的声音，让她能意识到你进来了，这样才算恰到好处。

有一回，新调来一位替班的警卫员，第一次见江青时穿着布面牛皮底的鞋，走路时，发出

“嘎吱”“嘎吱”的声音，江青说，“你这是什么鞋啊？可不得了，让我冒一身的大汗！”警卫员就赶紧换了双胶鞋，可房间里有一段铺的是橡胶地垫，鞋底蹭上还是“吱吱”响，江青要求他再去换鞋。又换了布底鞋后，这位警卫员紧张得都不知道该怎么走路了。他为了不出声，脚高高抬起再轻轻放下，就跟咱们有时候看的电影里那种慢镜头似的，江青又说：“瞧你那是什么姿势，怎么迈的步？”

杨银禄：后来到大会堂开会，她说：“小杨你得跟着我去，叫他（警卫员）坐前边，你坐到我旁边。”我说为什么呀？“给我壮壮胆儿，我太害怕他了。”就这样，小周坐左边，我坐右边，江青坐中间，警卫员在前边不知所措。

周：几十年后，我们在一次会议上相见，他已经认不出我了。当我问他“牛皮底鞋还出声吗”？他立即喊出“是小周啊”！可见此事给当事人的印象之深是一生难忘的。

赵：她心情好的时候，既不怕声音，也不怕风。在海南岛、青岛疗养，她乘坐舰艇高速前进时风很大，她在快艇上还指挥其他舰艇，大喊“全速前进”！并对李作鹏说：“你去告诉你的部队全速前进，我怎么指挥不动啊！”当时我观察江青，她一点都没出汗，也不怕风了。

周：在海南岛，有天晚上江青说早些睡，明天早点叫醒她好去赶海，把水桶和小铲子也备好。第二天拂晓全体出动，正赶上退大潮，江青兴致勃勃赶海，贝壳、小海蟹、海螺、海蛎子、海藻等捡了不少。太阳露出海面，海水又涨潮了，大家劝她回去，她自己把裤腿卷过膝盖继续走。海水漫过脚面鞋子湿了、水到了小腿、水过了膝盖、裤子湿了她全然不顾。我们担心她受凉在周围多次提醒，她才意犹未尽边捡海物边往回走。在海水中走了这么长时间，她也没任何不适。

江青在钓鱼台中心区10号楼住，窗户有四层玻璃，她说能听到军博路上的汽车声。还经常说外面鸟叫声、蝉鸣声影响睡眠。1970年11月，在海南岛高炮阵地，为了照相，她要求几门高射炮同时开炮，对震耳欲聋的炮声却毫不在乎。

郑仲兵（以下简称郑）：这在医学上有根据吗？

赵：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受精神因素影响特别大。比如兴奋点在摄影或赶海上，心情好的时候，对一些风、声音的刺激就不敏感也不在意。而在失眠时对声音就格外敏感。

周：江青还有个忌讳，就是怕在住处见到生人，因为见到生人会紧张，出汗，有时候还会生疑心。即使是每天送文件的机要通讯员对她也得回避。10号楼大门一进去就是一个厅，送信送文件的人，只要一听她要出来了，赶紧往两边跑。两边一个是开水间，一个是打扫卫生的工具间，能躲就躲。有一次江青没按铃就出来了，一个送文件的同志来不及躲了，就一下子蹲到沙发后面。没想到江青一下子坐在沙发上，我们紧张的心都要跳到喉咙口了，赶紧请她去空气新鲜的客厅散步，这才化险为夷。一位首长的警卫员说：一听江青要来大家都想躲开，可总得有个端茶送水的吧？轮到我值班只能硬着头皮送，真不知道你们这日子是怎么过的！

确实，江青常去的地方，人们一听她要来了，除了开电梯、端茶送水的服务人员以外，全都躲起来了，都怕飞来横祸。这是有前车之鉴的。

1968年春，江青到大会堂开会，在会议厅门口，周总理的卫士长成功很有礼貌地招呼她。谁知江青硬说成元功挡在门口不让她进门，怀疑里面开什么会。她气冲冲的往里走，在大厅门口江青大声叫：“总理，外面有条狗！”那天我在场，大家都很诧异，没见到周围有狗啊？

江青怒目切齿喊着：“孙维世是一条狼，成元功是条狗，历史上就是个坏人！”（孙维世是革命烈士孙炳文的女儿，总理的干女儿，文革时惨死在狱中）无论总理和与会者怎么解释她都不听，骂不绝口，还说“再也不想见到成元功了”。结果成元功进了学习班，而后在江西“五七”干校劳动了七年，我们两人曾在一个排劳动。他1940年14岁时参加革命，1945年到周副主席身边，陪同参加重庆谈判；解放后随同总理出访各国。跟随总理二十多年，熟知总理的工作和生活习惯，曾共同历经风险。说到总理在这几年的劳累、为难和无奈，老成唏嘘不已。他当时虽远在江西，但对总理的一切仍是牵肠挂肚，对江青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矛头指向总理十分愤慨。

李：说她怕见生人，在青岛栈桥那儿她也不怕见生人了？

赵：那是她有思想准备，要见群众啊！

周、赵：江青生性多疑、神经过敏，常怀疑有人害她。怀疑是多方位的，包括见到的人（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吃的药、听到的声音、在楼之外吃的食物等，这种例子太多了。

周：有次在16号楼开文革小组碰头会，会上她吃了不少樱桃，转天牙龈有些不适，就怀疑樱桃有毒，她追查樱桃来源、怎么清洗的。查的结果是来源清楚，同桌的人吃后都没什么不舒服，这才不了了之。

她在一些会议上见谁不顺眼或哪句话不顺耳，就说：“我一看你就是个坏人，××给我查查他是个什么东西？”

赵：1971年她去青岛，游栈桥时有几个群众认出她，有的鼓掌、有的呼口号，围观的人很多，当时她很受用，兴高采烈。之后反过来说成是有组织的围攻事件，趁人多的时候谋害她。

周：了解江青的人都尽量回避她，周总理和其他领导到江青住处，他们的警卫员和医护人员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不管多长时间都在车里等候，连喝水都是内勤给他们送到楼外。谁都怕惹上是非，还不如躲远些安全。

随着职务的升迁，尤其是她当上政治局委员后，权力在手，脾气更见长。大家最难办也最怕的，是一些生活上的事，往往会被她上纲上线扣上顶政治帽子。

赵：还有就是怕冷怕热，对温度要求苛刻。江青对室温的要求是，冬天摄氏21度正负0.5度，夏天26度正负0.5度，钓鱼台她住的所有房间和常去开会活动的几座楼以及大会堂、中南海、京西宾馆等开会的地方都要求统一温度。当时钓鱼台各楼房都用中央空调，后来配了单机空调。由于地方大，温度统一难度也大。我们把室温看成工作重点，小心谨慎地对待。而江青往往因为自己情绪不佳，硬说温度不准，无中生有，指责工作人员。

周：江青既要求空气新鲜又要室温只能有正负0.5度的波动范围，这副重担落在几位内勤兼楼内警卫同志的肩上。他们几位来自警卫毛主席的一中队，朴实、机敏、责任心强，素质都非常好。虽然有的来自农村，但尽快掌握了当时罕见的中央和单机空调通风技术。他们负责楼内警卫、卫生、烧水包括随车水箱的准备，有时还帮我们洗江青的衣服。多年来我们值班时，饭都是他们从食堂帮着打回的。为了让我们能安心睡一会儿，他们在门口值班时帮我们听打铃。遇到难事时都互相关心鼓励，这些战友给予我们最默契的配合和支持。

赵：江青对洗漱水、饮用水及饭菜也都有温度要求。有次她感冒，对温度格外挑剔，她喝水时，一会说：“你怎么给这种温吐吐的水？我的胃要坏了。你这是害人哪！”稍加一点热的，她又说：“你想烫死我？”我们只好找来一把水温计，校对好后，将入口的东西都经过测温。

她从不直接用卫生间热水龙头的水，嫌温度不恒定；脸盆的水不流动又不卫生。我们要在大搪瓷缸兑好水，她边洗手时要以一定速度给她倒水。后来我们也有经验了，水兑好了，放到自己手腕内侧这个位置试，这里的皮肤是最敏感的。经常试温，感觉也准了。

赵、周：除此之外，说到她的“怕”，我们听到江青多次说过“我不怕被杀头，就怕不死不活地给养起来”。说此话时表情凝重。要我们看，与其他几怕相比，这可能是她的最怕了。

郑：这或许多多少反映了她的性格和人生观。从后来法庭宣判时她高呼口号以及最终选择自杀为结局的举动看，在这一点上，她是说话算话的。至于如何评价她的价值取向，那是另一回事。

□ 原载《炎黄春秋》2014年第2期

~~~~~

【书刊序言】

《罗瑞卿案》代序：追寻历史的真相

• 萧冬连 •

“文革”时期，政坛上的波诡云谲总是超出正常人的想象。许多炙手可热的重要领导人一夜之间乾坤颠倒就成了阶下囚，令世人惊愕！“陶铸案”如此，“杨、余、傅”案如此，“罗瑞卿案”则是首开其端。时至今日，仍然很难说已经完全搞清楚了当年罗瑞卿为什么突然被打倒。许多关键性档案未予公布，研究者只能凭借有限资料拼凑出故事来。

近年对“罗瑞卿案”的研究有所进展，这得益于部分历史档案的披露和一些知情人的回忆和口述，由余汝信编辑的这本《罗瑞卿案》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努力。在我看来，这本书的重要部分就是对这些史料的披露和运用，其中有1965年12月叶群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摘录）、叶剑英在1966年3月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批判罗瑞卿会议上的讲话（节录）、1966年4月30日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年6月下旬刘少奇关于“彭罗陆杨”问题的讲话等，书中引用的其它重要人物在上海会议和北京会议上的发言摘要，虽然不全仍然很珍贵。余汝信根据有关资料撰写的《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事件的发展脉络。

在有关回忆和口述中，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人近年在香港出版的回忆录最值得重视，其中《邱会作回忆录》对罗瑞卿事件的记述最为详尽，其次是《吴法宪回忆录》。在这本书里又收录了一篇邱会作谈罗瑞卿问题的专访。这些回忆和口述之所以值得重视，因为他们参与其事（虽然不是直接当事人），也因为他们都是被抛出体制的人物，摆脱了政治羁绊和顾虑，比较愿意说真话，披露了一些内情，虽然难免带入个人情感。相对而言，《吴法宪回忆录》更为持中。这在目前档案不公开的情况下显得很珍贵。其实，一些私密的谈话很可能没有记录，党内高层微妙的人际关系更是非浸淫其中者所不能体察的，这就使知情者的口述具有特殊的价值。当然，无论回忆录还是访谈口述，大都凭借个人记忆，任何记忆的可靠性都是有限的，很难避免因时间久远而发生记忆错误，更不用说因个人好恶而作选择性记忆（或遗忘）。口述历史经常遇到的问题是“对共同参与或见证的一件事，每个人都有一套不同陈述”。因此，采信口述史和回忆录，

需要印证其它史料，最好对参与其事的双方的口述进行比照。可惜，有关罗瑞卿案目前还只有倾向林彪一方的回忆，而没有倾向罗瑞卿、贺龙一方的回忆。因此，对一些问题作出定论还很难。

除了口述历史的自然缺陷外，借见证人口述之名编造故事的“罗生门事件”也经常发生。对于林彪女儿林立衡写的《我所知道的有关罗瑞卿同志被诬陷和迫害的情况》是不是这种情况，我们不必下定论。这份材料是1980年两案审判期间写给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作者急于为林彪辩白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这篇材料有违事实则是明显的，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和见证人口吻，加上编辑者未经作者本人同意而擅自作了颇多改动及在境外公开出版，这就为厘清历史真相增加了新的混乱，依据已有资料对它进行辨伪是必要的，据编者说，组织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此。书中多篇文章围绕林文的真伪展开讨论，进而对罗瑞卿案的真相作出各自的解释。

关于罗瑞卿为什么被打倒，官方的解释归咎林彪的诬陷，这显然回避了主要事实，无论事情起因如何，作最后决断必定是毛泽东。这毋庸置疑，任何高层领导人的得势与失势，命运最终掌握在毛泽东手里。现在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要拿掉罗瑞卿？文革之初，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个人捆绑在一起，打成所谓“阴谋反党集团”，是服从于毛泽东发动“文革”部署的。其实他们倒台的因由互不关联。在这四人中，罗瑞卿与毛泽东渊源最深，关系最为亲近。历史上，罗瑞卿与林彪同属“双一”（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建国以后，公安部长“罗长子”被看成是毛泽东的大“卫士长”。罗瑞卿与林彪的关系也非同一般，1959年罗出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正是林彪向毛提议的。正因为如此，罗瑞卿突然被拿掉，说他反毛泽东思想、反林彪，不仅外界，党内高层都感到很吃惊。

毛泽东后来说，罗瑞卿、贺龙等人挨整是他听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词。这是事后的一个说辞。我在1999年的一本书中就提出疑问，“以他（毛泽东）的睿智和敏察，何以会听信一面之词呢？”我的推断是：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扳倒刘少奇时，需要林彪的坚决支援。因而在林彪与罗瑞卿之间，自然地选择林彪。”〔1〕顺便说一句，这完全是个人判断，与“官史”扯不上关系。只是当时对林彪与罗瑞卿何以交恶并不十分清楚。现在我们大体可以勾勒出林罗关系的发展脉络和症结。根据本书提供的线索及其它资料，我列出自1964年12月至1965年12月林罗关系发展的16件事（见注释）。〔2〕林罗矛盾皆由林彪生病请假，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而起。林彪对罗瑞卿疏离自己不满，认定罗改换门庭，投靠贺龙。1964年罗瑞卿组织全军大比武是一个爆点，吴法宪说，大比武被认为在突出政治问题上“同林彪唱了对台戏”。〔3〕邱会作则认为，“大比武冲击了突出政治”只是拿到桌面上的说法，实质是林彪发觉“贺、罗联盟”。〔4〕据叶群揭发，1965年2月，罗瑞卿托刘亚楼向林彪提出四条，要林多尊重罗，更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让罗去管。有无这“四条”已无法取证，无论罗瑞卿的本意如何，给林的信号是罗要林让权。这是问题的症结。从上海会议到北京会议，对罗的批判都集中在“向党伸手”的问题上，所谓“向党伸手”就是指要林让权，〔5〕可见林罗矛盾已经很深了。吴法宪说，“我十分震动，想不到庐山会议才几年的功夫，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竟然发展到这个地步！”〔6〕林立衡在上述材料中说林彪和罗瑞卿关系如何好，整肃罗瑞卿林彪事先“毫无所知”，事后还为罗哀伤流泪，这完全有违事实。韩钢、樊真、沪林的文章对此作了详细的辨伪。根据现有的材料，也不能证明林彪扮演的只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只是得知毛的意图后按照毛的意图行事罢了。我倾向于吴法宪的说法：“罗瑞卿的下台，提出问题是林彪，但下决心的是毛泽东。”〔7〕

现在看来，军内矛盾远比我们原来了解到的复杂。据邱会作的说法，“林彪暂时退出军委日常工作，主要由贺龙与罗瑞卿主持，罗瑞卿的砝码逐渐倾向贺龙一边。由此，军内逐渐形成两个阵营，贺龙、罗瑞卿等人为一个阵营，林彪与其他老帅们形成了另一个阵营。”“两个阵营的斗争达到尖锐化、明朗化的程度。”两个阵营的力量并不对等，不仅刘伯承、陈毅、罗荣桓、

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都是支持林彪的，更在于林彪与毛泽东的紧密关系。表面上贺龙气势很旺，其实“在军委内部几乎成了孤家寡人”。〔8〕从这些叙述中，我们感受到军队内部“阵营意识”之强烈，山头主义之根深蒂固。山头主义是历史形成的，无论褒贬它都是一个存在。平时相安无事，关键时候就分出阵营来。正因为这样，罗瑞卿的作为就显得特别的敏感。罗瑞卿不只得罪了林彪，同时怠慢和得罪了军内其他老帅，其中叶剑英、聂荣臻对罗的意见最大。邱会作就曾亲身与闻聂、叶二人发泄对罗不满的谈话，〔9〕李作鹏也回忆到这种情况。〔10〕向毛泽东“提出问题”也不只是林彪，我们知道的，叶剑英曾不止一次向毛泽东和林彪谈到罗瑞卿的问题，并与林彪商议向军内高层许多人打招呼。造成这种状况，部分可以归结为个人因素，即所谓罗瑞卿“身上有刺”的“霸道”作风。不过不能强调过分，更应看到权力配置失衡引出来的矛盾。罗瑞卿身兼数职，掌控全局，权倾一时，而其他老帅反而只负责部门工作（叶剑英管军训、聂荣臻管国防科研、徐向前管民兵），这种权力配置，加上罗的个性，难免不发生“怠慢将帅、越级上报和决断，引起将帅众怒”（韩钢语）的情况，罗却不自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毛泽东是否对罗瑞卿完全失去信任，拿掉罗瑞卿是注定了的，更何况正是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之际，亟需林彪支持和军队稳定。至于采取党内斗争的方式解决权力分配问题，这已经是一个惯例，处理高饶问题是这样，处理彭德怀问题也是这样。党内斗争一哄而起，无限上纲，群起而攻之，这种风气也由来已久。

当然这只是一种判断。还有另一种判断：不是毛听信林，而是毛本人逐渐反感罗，利用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将帅对罗的不满，逐罗出局。毛为何反感罗？原因是罗与刘、邓关系密切，毛酝酿打倒刘、邓的“文革”之前，需要先清除党内高层的“路障”。〔11〕本书丁凯文和樊真、沪林的文章都持这种看法。丁凯文的文章说：“毛发动针对刘邓的斗争，军权不能旁落。军队内部派系的纷争、罗瑞卿与老帅们和其它高级将领之间的矛盾正好被毛泽东所利用，而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矛盾则被无限夸大成为打倒罗瑞卿的唯一口实。毛泽东倒罗绝非是满足了林彪的要求，恰恰是满足了毛泽东自己的要求。”樊真、沪林的文章说，“罗的命运不在于林、罗关系好坏，而在罗在毛和刘邓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的立场和作为。毛要捣毁的是刘邓司令部的桥头堡——“彭陆罗杨”。罗瑞卿的生死牌握在毛泽东手上。”这种判断引证的主要是《邱会作回忆录》，而邱也是一个观察，并没有拿出可靠事实来。这里的关键是罗瑞卿与刘少奇、邓小平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毛泽东究竟怎样看待罗与贺、刘、邓的关系，这都还需要更多材料给予证明。

编者嘱我写序，特别说对罗瑞卿案的讨论持一种开放态度，我就写了这篇短文，也算是参加讨论吧！

2013年7月17日于北京

注释：

〔1〕萧冬连等《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红旗出版社1999年出版，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重印。

〔2〕1. 1964年12月29日，林关于突出政治和批评军训冲击政治的指示。

2. 1965年2月19日，林彪在上海听了刘亚楼转达的四点后严厉批评刘，并把自己对罗的不满向刘交了底。刘大呼上当。

3. 1965年4月22日，林见毛，商定杨成武增补为军委副秘书长兼第一副总长，似乎旨在削弱罗瑞卿的权力。

4. 1965年5月2日，罗到上海见林，林拿出毛选和党章，批评罗。并给罗提五条要求。

5. 1965年5月，军委战备会议，罗在军委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林十分不满，指示收回已下发的罗的讲话。

6. 5月19日, 罗提出大量增加部队定额和合并军区的意见, 林反对, 向毛报告获得支持。
7. 6月, 叶剑英专程去大连向林彪告状, 行前已向毛汇报。林交待叶抽出时间专门做‘打招呼’的工作。
8. 10月15日, 张秀川写揭发罗的材料。19日, 林批道: 罗“纯属造谣”。
9. 10月25日, 雷英夫给林彪送去一封揭发罗的信。
10. 11月18日, 免去被视为罗亲信的萧向荣一切职务。随后林彪下达指示, 要求全军“要彻底揭发, 不要有顾虑。”
11. 11月16日, 林电话报告毛, 提出明年全军工作的五条原则。20日, 毛批示: “同意”。
12. 11月末, 叶群授意空军吴法宪搜集并准备反映罗问题的材料, 叶群同时授意海军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三人写信揭发罗的问题。
13. 11月30日, 林给毛写信: 派叶群到杭州送材料和当面汇报罗的问题。林还表示随时准备同毛面谈。12月1日, 叶群在杭州向毛作了报告。
14. 12月2日, 毛在林报送的报告上作批示, 不点名批罗不相信突出政治, 搞“折中主义”。
15. 12月初, 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谢富治到杭州, 向毛泽东汇报罗瑞卿的问题。毛说“有野心就是新问题。你们告诉林彪同志注意身体, ‘长子’的问题由中央来解决。”
16. 12月8—16日毛泽东坐阵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处理罗瑞卿问题。
- (3) 《吴法宪回忆录》, 下卷,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6, 第556页。
- (4) 《邱会作回忆录》, 上, 新世纪出版社, 2011年1月版, 第374页。
- (5) 见叶剑英在北京会议上的讲话。
- (6) 《吴法宪回忆录》, 下卷, 第557页。
- (7) 《吴法宪回忆录》, 下卷, 第566页。
- (8) 《邱会作回忆录》, 上, 新世纪出版社, 2011年1月版, 第370、374页。
- (9) 邱回忆说: “一九六五年, 大约是五、六月间, 军委常委会在京西宾馆举行。会前, 叶、聂两帅在休息室谈罗的问题。我进去了时他们还在谈。我欲退出, 他们却招手让我坐下, 我听到叶帅说: ‘他真是利令智昏了, 人长、脚长、手也长!’ 聂帅说: ‘坏就坏在手长上!’ 虽然他们说的那些话未指出人来, 我的脑子一转, 也就知道是指谁了。叶帅还对我说: ‘我们谈的问题, 你是懂得的, 将来你会知道更多的问题, 估计你已经知道我们是说谁了。我们还要给一些同志打招呼。’ 关于罗瑞卿的问题, 叶、聂不仅仅是打招呼的问题, 而是教导我们要与罗的错误作斗争。”《邱会作回忆录》, 上, 新世纪出版社, 2011年1月版, 第377—378页。
- (10) 李回忆说: “随着罗瑞卿权力越来越大, 据我所知, 当时已有老师对罗在军委的日常工作中, 小事不请示, 大事不报告, 对老师工作不支持等颇有微词, 叶帅、聂帅就是其中的两位。当然向军委第一副主席林彪的请示报告就更少了, 林彪批评罗瑞卿‘根本不来见面’。”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 下卷,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11, 第537页。
- (11) 见本书韩钢撰文。

□ 原载《罗瑞卿案》, 余汝信主编, 新世纪出版社, 2014年2月版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